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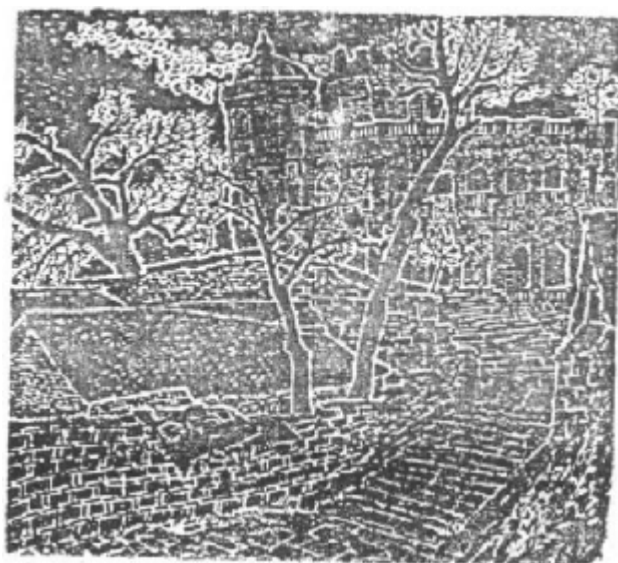
2201

貴陽 文史

GUI YANG WEN SHI 1996 1

貴陽文史

1996. 1



《贵阳文史》编辑部

顾问: 廖海波 章德华
杜云峰 王萼华

编委主任: 杜云峰

编委副主任: 李守明

编委: 尹克恂 韦廉舟
朱崇演 孙重贵
宋洪宪 何静梧
袁伯康 顾大全
张 垠 张建军

主编: 李守明

副主编: 朱崇演 何静梧
张建军

责任编辑: 高书勤 李人选

美术编辑: 杜 宁

主办单位: 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单位: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印刷单位: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
统一刊号: CN52—1104/K
出版单位: 《贵阳文史》编辑部

地址: 贵阳市中华中路 114 号
邮编: 550001
电话: 5823930
定价: 5.00 元

改版致读者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贵阳文史资料选辑》改版的《贵阳文史》第一期今天与读者见面了,套用流行歌手的一句话:“希望读者喜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阳市政协编辑出版了《贵阳文史选辑》48辑,刊载了200多万字的各种“三亲”史料,发行到全国各省区的许多单位。《选辑》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周恩来主席倡导的文史工作方针,较好地发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功能,成为定期在国内发行的期刊。这里有中共贵阳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有贵州省政协的指导和广大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改为《贵阳文史》后将作如下改变:

1. 刊物版本改为16开,篇幅为98页,仍为季刊。
2. 工作重点,转向建国后史料的征集、编辑和出版。
3. 本刊设置的栏目是:史海钩沉、史海拾贝、史实综述、筑城旧事、名人留踪、文史之窗、文教春秋、科技轶迹、筑城园丁、工商今昔、抗战征文、战地纪实、革命轶闻、奋斗历程、名人轶事、名人专访、难忘瞬间、民族团结、文史集粹、文史论坛、往事追忆、商榷探讨、文史信息、史坛动态、质疑订证。
4. 主办单位为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协办单位为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除以上变动外,本刊的办刊宗旨,征集内容和出版发行范围仍然沿袭《贵阳文史选辑》的原定内容。

1995年11月召开的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强调,继续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因此,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加强,不应削弱。我们当根据这一精神,继续坚持文史资料的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选征精采”,增强精品意识,扩大发行量,以争取更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竭诚希望爱护本刊的作者和读者,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支持,源源赐稿,共同来耕耘这块园地。

《贵阳文史》编辑部

目 录

EA31/28

纪念贵州护国起义 80 周年

-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 廖海波(1)
- 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 冯祖贻(2)
- 贵州护国起义 顾大全(4)
- 护国运动在贵阳 何静梧(8)
- 贵州护国起义与王文华 吴照恩(10)
- 天津会议七君子中的陈国祥 修文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2)
- 女教师断指明志 陈廷缙(13)
- 贵州都督府接管中国银行贵州分行 钱存浩(14)
- 贵州护国起义领导层人物简介 本刊资料室(16)
- 踢翻洪宪帝座 千秋永念此时
——记贵州护国起义 80 周年纪念大会 杜松竹(19)
- 贵州护国起义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
护国军将士后裔发言摘登 本刊资料室(21)
- 贺电、贺词选登 本刊资料室(23)

文教春秋

- 贵阳河滨中学 李梦骅(27)
- 回忆贵阳中山中学 尹慎吾等(33)

抗战征文

- 回忆七·七抗战 黄冠英(38)
- 缅怀杨家骧将军 张汝芳(40)

筑城园丁

- 怀念严余春老师 王一民(42)
- 一生为国育才的李光忠教授 刘纯嘏(45)
- 深切怀念我的父亲高士光 高言桢(48)

名人留踪

徐悲鸿大师在贵阳	闵乃文(50)
----------------	---------

人物春秋

陈职民生平简介	王 伦(53)
先父吴剑平将军生平	吴达棋等(56)
布依族知名人士刘剑魂	刘泽渊(59)
国民党时期的贵州历任省主席简介	陈廷缙(63)

革命铁闻

卢焘先生营救韦拔群的前前后后	韦宏孔(68)
葛天回与梧州地下党联络站	松 江(71)
我办《黔风报》	谢凡生(72)

文史之窗

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成功的一例 ——倡议修建“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小记	朱崇演(75)
---	---------

筑城旧事

解放前的贵阳敬之植物园	金通一(77)
-------------------	---------

文史论坛

陈惕庐是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吗? ——兼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尹克询(79)
贵州人民对我国旧民主革命的重大贡献 ——兼论护国运动的重新评价	洪 波(84)

史坛动态

“一二·九”运动 60 周年“一二·一”运动 50 周年纪念 座谈会侧记	袁伯康(90)
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贵州文史图书获四项奖 三人被评为优秀文史工作者	刘先庆(92)

书讯

《贵州与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出版	(93)
《贵州当代史》出版发行	(93)
稿约	(94)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

○ 贵阳市政协主席、研究会名誉会长 廖海波



廖海波主席在会上发言

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贵州在护国运动中第一个起来响应云南起义，贵州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复辟帝制，以鲜血和生命维护共和制度，挽救孙中山首创的民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省市史学界集会隆重纪念，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任何一场革命，都会经历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历史只有“经过许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袁世

凯逆历史潮流而动，搞复辟，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云贵首举义旗，反对帝制，反对复辟。这场斗争以打倒了袁世凯而取得胜利，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民族的觉醒，标志着民主共和观念的确立。

护国运动不仅是反对袁世凯复辟，也反对他卖国，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大家知道，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把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这种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同胞的坚决反对。

由于护国运动的反复辟、反帝国主义奴役性质，因而当时进行的护国战争是正义的，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得人心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反动派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时，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讲袁世凯。他说“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

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

○ 冯祖贻

八十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却不可能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独夫民贼袁世凯篡夺，意味着共和制的前途存在着极大危险。

果然，当袁世凯通过镇压“二次革命”，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驱逐到日本，志得意满，便大踏步向复辟帝制轨道上走下去。他废除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又解散国会，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两个主要标志统统废弃。1915年8月，袁世凯的两个外国顾问：英国人古德诺、日本人贺长雄上台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声称中国适合帝制，不适合共和；接着由袁世凯一手策划的“筹安会”出笼，大肆鼓吹只有复辟帝制才能救中国，而皇帝

只有袁世凯才能承担。从9月起，帝制活动走向公开化，袁世凯及其各地的同伙强奸民意，导演了一出“国民代表大会”“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丑剧，12月11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封了一批亲王及公侯伯子男爵位，设立大典筹备处，制皇冠，造御器，织龙袍，改年号，准备1916年元旦正式接位登基。

袁世凯复辟帝制图谋，代表着国内少数袁氏亲信及复辟势力的利益；同时得到各国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为换取他们赞同帝制，对中国主权大肆拍卖。1915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了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袁氏政府竟然同意。因此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仅是历史的大倒退，而且意味着一个更黑暗的时代来临。

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和卖国行径一经暴露，便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孙中山为

推翻。”他总结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中，贵州军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袁世凯宣战。据资料介绍，当时袁世凯直属的北洋军有十二个师，还在贵州周边的湖南、四川安插了他的亲信，拥有相当数量的北洋军，而贵州出兵时只有六个团（实有八个营）的黔军。无论在人数、装备、后勤补给上都远逊于敌军。面对强大的敌人，贵州军民为了正义和真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凭着满腔热血，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率先参加护国运动，与全国人民一道，最终硬是把袁世凯这个复辟狂拉

下了洪宪皇帝的宝座。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至今仍有强大的感染力，给后人以启迪。

借此机会，我们对护国战争中为反对复辟、反对卖国、捍卫共和制度而牺牲的先驱者们，表示深切的哀悼，致以诚挚的敬意。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贵州护国起义80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光荣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努力拼搏，为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为兴筑富民，振兴贵州作出新的贡献。

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流亡日本,但重新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决定“雪癸丑之耻(指二次革命失败),竟辛亥之功”,派党员在各地发动讨袁武装起义,维护共和制度。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从“拥袁”走向“反袁”,秘密策划举兵。当时全国军事力量大多被袁氏控制,只有云南武装力量还掌握在地方实力派唐继尧手里,而云贵两省在经历辛亥革命之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下级军官中经久不衰,存在着发动讨袁武装起义的条件。而云南中下级军官又将发动起义的领导人寄望于曾领导云南辛亥革命的蔡锷身上。1915年12月,蔡锷秘密南下由越南入滇,此时云南已聚集了各种反袁势力,25日终于发出了宣布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的通电,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云南军政府组成后即组成三支护国军,第一军的蔡锷为司令进军四川,第二军李烈钧(老国民党人)为司令进军两广,第三军的唐继尧兼司令驻守昆明。

云南起义震动全国,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组成护国黔军,分东路(王文华为司令)、北路(戴戡为司令)分别向湘西、四川进发。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而对中国人民反帝制、反袁、拥护共和的进步潮流,帝国主义迅速改变了支持袁世凯的态度,日本反过来支持反袁势力,妄图在混乱局势中取得更大利益;袁世凯的部下如冯国璋等也与袁三心二意,袁世凯被迫只得于3月22日颁布废止洪宪年号。从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2日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制起,也不过103天。

袁世凯虽然宣布取消帝制,但他还想赖在大总统宝座上不走,全国人民反袁斗争又兴起高潮,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在各地武装起义有数十次,遍布全国。袁世凯任命的将军、巡按使,或迫于境内反袁势力的压力,或为保持自己地位,也纷纷宣布脱离袁氏独立。4月,广东、浙江独立,5月,陕西、四川、

湖南独立。其中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独立对袁打击尤大,6月6日,在众叛亲离中,袁世凯终于死去。护国运动终于将帝制阴谋及制造者袁世凯送入坟墓。

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护国运动的宗旨是要恢复孙中山公布的《临时约法》和据此而成立的国会,并誓死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国贼袁世凯,这说明护国运动在政治上是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前后一致,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有人说辛亥革命首创共和,护国运动维护共和,这个话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护国运动是民主思想的一次大宣传、大普及,使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尽管不久又发生张勋复辟,但仅仅几天便遭到全国人民反对。人民群众觉悟提高,应与护国运动以实际行动再次揭露了帝制复辟阴谋有关。

第三,护国运动处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朱德、刘伯承、贺龙、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都曾挺身投入战斗行列,并为之付出代价。可以说正是护国运动的正义性,才促使他们投身于这场运动;也正是这场运动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列,因而带来许多弱点和不足,这正是他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起点。因此护国运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到五四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梯。

第四,护国运动的胜利和袁世凯的败亡还证明了一条真理:一切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终将被人民、被历史抛弃,只有站在历史前进的角度,顺应历史的发展,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作者系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顾问、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书勤)

贵州护国起义

○ 顾大全

今年1月27日是贵州护国起义80周年纪念日。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个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即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都参加了反封建帝制的斗争;通过反袁斗争,它表明了人民进一步觉醒,破除了对封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拥护民主共和,要求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反对倒退,促进了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所以说护国运动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意义。贵州护国起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在对推翻袁世凯洪宪帝制,遏制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复辟,避免了历史上的一次倒退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我省各族人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举义旗,宣布独立,开始了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独立通电中,当时贵州的军政首脑刘显世及戴戡、任可澄参与联名,因此又称滇、黔起义。

一、贵州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贵州酝酿起义首先是从黔军青年军官开始的,他们之中有的是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有的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他们原希望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使国家独立富强起来。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只是赶跑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封建军阀官僚的政治机构仍没有改变。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破坏国会,毁弃《临时

约法》,实行独裁专治,进而复辟帝制,这不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慨,特别受到军官的强烈反对,其中以王文华反对最力。

云南起义后,王文华力劝刘显世桴鼓相应,陆军青年愿为其后盾。但刘显世认为,以云南一省之力讨袁,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贵州万不宜从井救人,同趋灭顶”。不仅如此,他还向袁世凯告密说:“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臣统驭无方,罪合万死。”刘显世的立场激怒了王文华。他愤然对刘说:“吾誓与共和国同命,事在必行。爵使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幸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其他团长也持同样态度。熊其勋在致刘显世的函中说:“现在的形势,非独立不可。吾已义无反顾,将来无论成否,功罪均在公”云云。他在另一函电中说:“袁氏叛国,帝制自为,以公有之国家作一人私产,蔑弃约法,背誓食言……”我“身为国家军人,非同一姓走狗,但能报国,虽死犹荣。”他为了表示决心,将自己的子女二人改姓寄养。吴传声也上书刘显世,表示“义不帝秦”,并说:“中华民国,吾先烈铁血所铸造者也,今败坏至此,而幸生畏死,趋利避害者踵相接声,实耻之。”要“宁死疆场”,决不让国贼逍遥自在,词旨激昂,见者为之动容。他们的态度,反映了广大官兵的心声,有力地促使刘显世转变立场。

其次,梁启超、蔡锷也对贵州进行了策动工作。梁启超在筹安会出笼之后,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长文,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公开揭起反袁护国的旗帜,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伐加快,梁启超与蔡锷、戴戡、

王伯群、汤觉顿、陈国祥、蹇念益在天津多次召开会议，密谋倒袁。戴戡、王伯群与贵州上层有密切关系，戴曾任贵州民政长和巡按使，被立宪派称为“奇士”；王伯群是刘显世的外甥，能在刘的面前直接进言，所以他们便成了梁、蔡与贵州联系的重要人物。

云南的护国起义，决心用武力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共成立了三个军，第一军由滇军主力组成，以蔡锷任总司令，向川南进军；第二军以李烈钧作总司令，由云南展旆而东，攻取两广；第三军由唐继尧兼总司令，坐镇云南。另外还组织以黄毓成为司令的挺进军，相机行动。

袁世凯为了镇压云南起义，成立了“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主持对护国军的用兵计划。袁世凯认为，云南护国军的兵力，比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五省联合的力量小，而他这次投入的兵力又比上次大，一定可以稳操胜券。因此，他限令曹錕在六个月内平定云南。

根据双方的战略部署，贵州的独立，对稳定云南基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北洋军入黔，直接威胁到护国军的后方，并影响到四川的进攻。因此，争取贵州独立，巩固云南外围，便成为护国军刻不容缓的任务。由于刘显世态度暧昧，需要一位得力的人对其进行工作；而以王文华为首的黔军主力，虽然支持云南起义，但兵力单薄。于是云南方面派戴戡和徐进率云南护国军先遣纵队入黔，并携带援助贵州的山炮八门，炮弹四千发，以支持贵州独立。

1916年1月3日，戴戡、徐进率护国军先遣纵队从昆明出发。当纵队抵黔边时，由于刘显潜设防阻挡，纵队只得采取搜索战备行军的方式，派出侦察队为前锋，侦察队分为四组，从滇黔边界的亦资孔到盘县为第一组，由沾益至茅口河、郎岱为第二组，由花贡至安顺为第三组，由郎岱至贵阳为第四组。1月11日，刘显潜指使兴义官绅各界，连续发出函电，阻止纵队进入贵州。函电说：“滇军若来，北军亦来，贵州将为战场，黔不甘受其祸。”又

说：“如果要进兵黔省，必须俟双方磋商就绪，方可进步。”当时，纵队根据探报报告，刘显潜派易荣黔团由盘县移驻亦资孔。亦资孔为由滇入黔要隘，如果黔军抢先占领，据险扼守，必增加纵队入黔的阻力。为此，纵队决定，趁易荣黔未到之前，先占领亦资孔。1月12日，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抢占亦资孔，打开了滇军入黔的大门。随即进军两头河，进逼盘县县城。易荣黔巡防军，名虽一团，实为一营；且系新募之兵，枪械陈旧，战斗力极差。戴戡、徐进以滇黔团结为重，约请易荣黔到两头河协商，并在途中拦截了贵阳派往云南阻止滇军入黔的代表。易荣黔在戴戡、张彭年（张当时正在兴义劝说刘显潜支持起义）等人的劝说下，同情起义，使戴戡一行得以顺利通过黔西南地区。与此同时，云南方面恐贵州反对滇军入黔，纵队兵力单又增派黄毓成挺进军入黔，以支持纵队。纵队抵达安顺后，致电刘显世，促其速行宣布独立。

1916年1月24日，戴戡率纵队抵达贵阳，对刘显世形成军事压力。戴戡是进步党的活跃分子，善于词令，他一方面向刘显世集团介绍反袁斗争的形势，晓以大义，促使该集团内部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向各界群众进行宣传，争取群众的同情与支持。1月26日，戴戡在贵阳各界数千人的集会上，发表了理直气壮，言近旨远的长篇演说。他以大量的材料和亲身的经历，揭露了筹安会的罪恶阴谋；声讨了袁世凯丧权辱国，倒行逆施，实行专制独裁的种种罪行。指出：北洋派内部争权夺利，分崩离析，深为国家人民所痛恨，如果我们不起来推翻袁政府，我们就成了帝国主义所诬蔑的“是天生特种亡国民族”，使庄严的共和国，随印度、琉球之后，续演亡国的惨剧。滇黔唇齿相依，各界要同心协力一致讨袁。戴戡为了消除贵州方面的顾虑，向大会表明了纵队来黔的态度：“一、不占各重要机关位置；二、诸君教我作何事，我即作何事，但仍须受本省护军使之指挥。至以现在个人之决心而论，此身在天津会议时即许与诸同志，许

与共和国家。革命要我在何处死，就在何处死，皆为诸同志及共和国家之命是听。”他进一步鼓动黔中父老要当机立断，“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它哉。再论成败一层，袁世凯既已众叛亲离，不亡何待！”戴勘的演说，道出了贵州人民的心声，听者动容，得到各界人民的热忱拥护。黔中人民称戴是“不为爵禄所诱，险阻所难，薄富贵尊荣之参政不为”的反袁义士。他的演说，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贵州反袁运动的发展。这时，全省人民反袁的浪潮高涨，文化、教育、工商各界群众，连续举行集会，愤怒声讨袁世凯的罪行，要贵州急起直追，率黔中健儿与袁决一死战，贵阳大街小巷为之沸腾，说明了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觉醒，有力地促使了刘显世态度的转变。刘显世在内外形势之下，表示“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

二、贵州的独立与军政府的成立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宣布“反对帝制，永护共和”，接着，发表了《独立通令》。通令说：“逖以袁氏，背叛国家，窥窃神器，逞其凶焰，举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愤其僭窃。痛其凶残，以大义相责，重任相托。本都督顾念国家，关怀桑梓，不忍四方豪俊无限头颅、心血铸造之民邦，沦于奸人之手，重以逆军逆湘而上，咄咄逼人，亡国破家，迫于眉睫。于本月27日，俯顺舆情，宣布独立。”

同时，刘显世发布了《安民告示》。告示说：“溯自辛亥反正，改建共和民国，同胞艰难缔造，不惜为国流血。共冀政治改良，从兹日有起色。不料袁氏称帝，甘为叛国蠹贼。财政专事搜括，小民膏脂尽绝。外债逾数万万，用途全不明白。外交事事失败，以致丧权辱国。肆意戕杀善类，信任无非奸慝。此次国体投票，纯以利诱威迫。种种专横残暴，罪状难以殚列。国家濒于危亡，万众离心离德。滇省首创义举，誓将袁逆讨灭。同心巩固共和，联合各省一轍。滇黔休戚相关，人民义愤切迫。本省急图自保，各界开会公决，上书请设都督，

统辖军民一切。本督义不容辞，兴亡匹夫有责，为此宣布独立，人民勿得惊骇。官吏照常服务，四民各安生业。各国原订条约，继续履行勿越。外人生命财产，保护尤应特别。如敢造谣生事，立按军法处决。合行布告周知，其各凛遵切切。”

接着，又向全国发布了“敢声其罪，与众讨之”的《讨袁世凯檄文》。此外，刘显世还将云南起义时被云南列名的《通告全国共同劝告之漾电》（1915年12月23日），《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请同申义举之有电》（1915年12月25日），《誓告全国申明护国宗旨书》（1916年1月1日）等文电，一一重新公布，号召人民一致奋起，共讨国贼。

这时，在兴义就任贵州巡按使的刘显潜，也发表了赞成起义的通电，他在致贵阳各界的电文中说：“承蒙诸公谅解，责以大义，潜始终以于大局本无容二心，既不见谅于中央，遽以重兵压境，使无辜人民遽遭锋镝。潜虽不武，何敢惮劳！现将各要隘严密布置，一死相拼，祈公等释念。”刘显潜态度的转变，使全省反袁力量统一起来。

贵州独立后，推举刘显世为都督。为了组织领导全省反袁斗争，制定了《贵州都督府及所辖各机关暂行组织大纲》。根据《大纲》成立了贵州都督府，全省军民及军政各机关均由刘显世都督直辖。特设都督府本部，综理军民要政；设民政厅，专理行政事务；设财政厅，专理财政事务；将原审检厅改为军法局，警察厅改为军警局。各道尹即行裁撤，各县知县及所属民政、财政各局、处、所，一律照旧。

刘显世根据上述《大纲》发布了委任令，熊铁崖为都督府秘书长，何麟书为民政厅厅长，胡曜为军法局局长，李映雪为军警局局长。并规定了各厅局的任务和职权。各道尹裁撤后，设立东、中、西三路刺使；王伯群任东路刺使，吴协安为中路刺使，陈志苏为西路刺使，他们作为都督的代表，内参机要，外治民隐，负责察吏安民，成为都督府与地方社会的枢纽。王伯群还协助王文华筹划攻湘事宜。

贵州独立后,即以黔军配合护国滇军,出兵讨袁。蔡锷将滇黔的护国军编为“护国军滇黔联军”(即护国第一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当时,黔军为了配合护国滇军,各团长迭致函电,要求戴戡出任军职。1916年1月28日,蔡锷、唐继尧、刘显世联名任命戴戡为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将出征黔军改编为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下辖东路、北路黔军。戴戡亲自率北路军出黔北,攻綦江。其目标在于配合川南护国军主力,攻取袁军曹錕总司令部所在地重庆,以截断叙、泸之敌的后路。

右翼军北路黔军,是由原驻黔北桐梓、松坎等地的熊其勋第五团和继圣第六团(和后来不愿反袁出走,由胡忠相接任)组成。每团各三个营,编为一个梯团,约二千余人,由熊其勋任梯团长。另将戴戡、徐进率领的纵队,亦分为两部分,将机关枪队、炮队拨归北路,骑兵、步兵调归东路黔军。

王文华在贵州独立时,慨然以进军湖南为己任。在他的主持下,将黔军一半的兵力第一、二、三团,编为护国黔军东路支队,隶属于护国第一军右翼军,由王文华任东路支队司令兼第一团团长。王率第一团从贵阳出发,兼程疾进,进抵湘黔接界的龙溪口,设司令部于此。同时,令彭文治率领驻铜仁一带的第二团,在铜仁集中后向湘西的麻阳进军。吴传声率领的第三团,在黔东南的天柱县集中,以湖南的洪江、黔阳为进攻目标。

两路黔军进入战场后,均能精诚团结,英勇杀敌,连败北洋军。在綦江一线,北路黔军连克九盘子、赶水、大沙沟、东溪等十余处要隘,歼敌三千余人。东路黔军,以数千之旅,敌数万虎狼之师,连克晃县、洪江、黔阳、沅州等湘西重镇,迫使袁军将领自戕,军心震动。两路黔军的出击,使入川入湘的北洋军遭受沉重打击。在护国战争史上,谱写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英雄篇章。

护国战争开始后,贵州都督府还发布了一系列对内外文告。广泛宣传贵州独立的正义主张,阐明贵州的内政、外交方针。如在贵

州都督《告示》(五)中申明,“凡民国颁布之法律规章,及本省未经宣告独立以前,本国与各友邦所订条约、合同,一律遵守。”在《保护教堂告示》中重申:“凡民国颁行一切法令规章,尤当继续履行。”省垣及各县乡场,市场镇“凡有教堂所在地点及传教人等,自应认真保护,以重邦交”。这些文告,对争取各国支持贵州的独立,以集中力量讨袁,是有一定作用的。对内方面,都督府颁发了有关财政、金融、公口、鸦片、税收等问题的一系列告示。如财政厅在金融方面的告示中规定,“(一)在各县局征收的丁粮厘税中,所有中国银行兑换券及本省纸币,一律照常收受。(二)贵州纸币,仍受每月抽签收换十万元。(三)三、四两年公债票,仍由中国银行付息。”这对稳定金融、物价,安定人心是有重要作用的。对抗敌社会秩序、危害民生的山堂公口,严禁开设,“如敢违抗,处以极刑”。对毒害人民的鸦片,下令严禁栽种,如有种者,“重惩不贷。”以上通电、文告,所制定的各项措施,是比较符合当时贵州的实际情况的。虽然有的文告并没有认真贯彻实行,但总的来说,这些文告对安定社会秩序,动员和团结人民开展反袁斗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当护国黔军在綦江、湘西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时候,为了鼓舞士气,为瓦解敌军,都督府不断发表形势通令,把前线的战况通告全国。如2月上旬的《通令》中指出:“我军所向无敌,捷报频来。”指出护国军“省北一路,自戴总司令率护国军由松坎入川,节节进攻,连战皆捷。……东路王司令官文华等电称,我军于攻克晃州、占领吴公关后,进据便水。”“逆亡无日,袁贼授首早暮间事。”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号后,贵州都督立即通电宣布三事:“一迫使袁逆退位,听候国民依照约法裁判;二、请黎副总统遵照约法代行总统职权;三、根据约法及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正式大总统。”以后,在成立护国军务院及袁世凯暴毙后,贵州都督府也不断发表通电,表明贵州的立场和主张。

护国运动在贵阳

○ 何静梧

今年是护国运动胜利八十周年。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重要的革命斗争。护国运动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目标,以滇、黔两省独立武装反袁为主力,贵阳是昆明之外的又一个革命中心。贵阳各阶层人民在护国反袁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贵阳最早揭开反对袁世凯称帝序幕的是达德学校师生。1915年(民国4年)8月,杨度等在北京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并将启事寄给达德学校,目的是征集拥戴者。达德学校师生接到启事后,极力反对帝制。一方面师生积极编演新剧(话剧)宣传反对帝制,主张民主共和。9月2日起连续五天演出新剧《亡国恨》、《共和鉴》,前者描述韩国帝制之末路,后者描述美国共和之成功,3万余人观看了演

出。另一方面,于9月19日,由凌秋鹗、黄齐生、聂守微领衔直电筹安会反对帝制,电文云:“北京筹安会诸君均鉴:章启谨悉。方今国事安危,全在执国命者是否诚信相孚。君主之说适足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望速解散。敢布区区。”这篇电文是贵阳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

12月12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25日,蔡锷等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通电武装讨袁。不久,组成护国军出征。消息传到贵阳后,筑城各阶层民众纷纷主张效法云南独立,武装讨袁。贵阳知识界肖廷葵上书护军使刘显世,要求“滇已开其先路,黔即踵其后尘。……以爱国之热忱,问其滔天之罪恶,相率河胖子弟还我河山。……不朽之勋当与黔灵并

结束语

贵州是继云南起义后第一个宣布独立的省。这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贵州人心的表现,也是中国人民坚持民主革命斗争的必然趋势。当贵州宣布独立后,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相庆,大街小巷,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这说明了反袁护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刘显世参加讨袁护国在客观上对护国运动是起着积极作用的。从贵州内部来说,由于刘的参加讨袁,消除了最大的阻力,团结和统一了全省反袁力量。如1916年3月初。正当叙、泸主攻战场上后援不济、军情紧张的时候,贵州尽最大努力汇款给第一军,使蔡锷十分感激地说:“如周竟推食食我,此情实可感激。”从外部来说,贵州独立,使滇黔联成一

片,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四川和湖南两个主要战场受到侧面攻击。护国黔军以有限的兵力,抗击了川、湘前线约百分之四十的北洋军,有力的策应了叙府、泸州主攻战场上的云南护国军,推动了各省反袁运动,加速了袁世凯统治的崩溃。袁世凯“以失贵州故,致使步步作战,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之袁军大受其牵制”。以后“讨袁军的胜利,其获助于贵州者尤多。”所以说,贵州的独立起到了“一举足而形势顿殊”的重大作用。

纪念贵州护国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了英勇的牺牲和伟大贡献,继承和发扬护国起义爱国主义精神,对推进贵州四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高书勤)

峙。”贵阳出版的《贵州公报》(一种日报)发表《卫黔即以卫滇》等文,指出滇黔唇齿相依,当局宜早日独立反袁。

1916年(民国5年)1月18日,贵阳各界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绅、学、商、工、农代表两千余人愤怒声讨袁氏窃国罪行,会后推举代表往护军使署,上书刘显世,要求宣布贵州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24日,参加云南首义的贵定人戴戡率护国军纵队由昆明抵达贵阳。26日,贵阳各界人士在省议会集会欢迎,戴戡在会上发表演说,在历数袁氏祸国罪状后,慷慨陈词:“……又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他哉!”听者为之动容,会场掌声雷动。

贵州的统治者护军使刘显世在云南首义后,陆续演出了在滇黔边界阻挡护国军,向袁索要军饷、密电叛卖等一系列丑剧,暗中助袁。这时,在贵阳各界反袁呼声压力下,在黔军青年军官王文华、熊其勋、吴传声等力主武装反袁的要求下,迫于形势不得不转变态度。1月27日,刘显世发出独立通令,宣布贵州独立,刘显世被推为都督。这天,贵阳城内张贴独立的布告,全城店铺、居民住宅门前,遍贴红纸墨书的“巩固共和”标语,高挂五色国旗,百姓喜形于色,当时报纸称“家家同心,人人一致”是“真正民意之表现”。

贵州宣布独立后,云贵组成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滇黔联军,戴戡被任命为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不久,戴戡率北路黔军北伐四川綦江,东路黔军司令官王文华率东路黔军东征湘西。贵阳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支持前线活动。3月19日,贵阳各界成立“贵州征兵抚恤会”,颁发布告,支援护国军出征。顿时,贵阳家家出钱,户户捐金。4月2日,贵阳召开公民大会,动员支前。9日,贵阳妇女一万余人在贵州公园(即梦草公园,在今贵阳市委大院内)集会,黄淑媛、汪继坤、赵德馨等女士上台发表演说,号召捐金抚恤将士及其家属。会后,有的拔下簪子,有的摘下耳环,有的倾囊而出,各尽所有,表达爱国之心。5月13日,达德学校师生召开谈话会,欢迎该校毕业生、出征受伤回省的王达时座谈。7月16日,王文华率东路黔军凯旋归来,达德学校师生赠陆军旗一面表示敬意。24日起连续六天,达德学校编演新剧《恢复共和》于夜间演出,教员凌秋鹗作幕外演说,观众达四万余人。当时,梁启超夫人归宁来筑,亦欣然前来观剧。

在举国一片反袁声中,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去。护国运动终于取得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高书勤)

(上接26页)文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邓健、研究会副会长张垠、省文史馆员王得一、周渔璜、周钟瑄研究会副会长欧阳震、省书协杨霜、南明区政协文史委主任左北方、老同志刘铭简、聂俊。

为纪念大会赠画的有老同志申根源、杨青、青年画家杜宁。

(责任编辑高书勤)



贵州护国起义与王文华

○ 吴照恩

今年元月27日,是贵州护国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场为史家称为辛亥革命后第三次革命的运动中,贵州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笔者曾有幸接触过参加这场起义的一些先驱者,亲自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加上笔者平时学习之所得,写成此文,供大家研究。

一、护国起义,应称“滇黔护国起义”

护国起义,确切地说,应称“滇黔护国起义”。笔者青年时代,曾聆听当时参与护国起义的几位先驱者:卢涛(寿慈)、窦居仁(以庄)、胡刚(寿山)以及平刚(少璜)等先生的论述,他们都称起义为“滇黔起义”;谈到贵州人参与这场运动的情况,他们都充满自豪!并一致认为,此次起义,若没有贵州人参与,是不可能举发并获得成功的。

护国起义在酝酿阶段,参加会议的共有七人:梁启超、蔡锷、汤觉顿、戴戡、王伯群、陈国祥、蹇念益。其中除梁、蔡、汤三人而外,其余四人均为贵州人。

会议前,蔡锷为了反袁而秘密分咨各省,皆持重不敢发。会议决策在云南昆明起义时,又顾虑贵州当局的意向。万一有异,将影响整个起义全局。正是此时,王伯群斩钉截铁地表示:“贵州陆军实力,在吾弟文华之手,当局(指刘显世)文华可以左右之,所部成军虽浅、气盛,可以一战”。蔡锷听了,喜出望外,当即拍案而起曰:“吾乃知贵昆仲非常人也。黔既把握,吾决冒险入滇。”可以说,蔡锷最终能下定起义决心,是王伯群代表贵州帮助他下的。

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发表讨袁檄文时,在文告上签名的有蔡锷、唐继尧、刘显世、戴戡、任可澄等五人。其中除蔡、唐两人外,其余三人均是贵州人。而且发表讨袁檄文和昭告海内外文告,都是任可澄一手草拟。在直接带兵打仗的蔡锷、戴戡、王文华三人中,除蔡锷外,王、戴都是贵州人。贵州独立后,蔡锷将滇黔护国军编为“滇黔护国联军”,蔡自任联军总司令,戴任该联军右翼司令,在戴的任命状上,是由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三人联名签发的。从人力物力的负担上看,三个战场,贵州负担了两个:戴戡任联军右翼司令,率黔军五六两团从遵义进攻重庆,是为北战场;王文华任护国军右翼东路支队长,经镇远、玉屏攻湘,是为东战场。当蔡锷率领的滇军在四川叙、泸第一线弹尽粮绝、岌岌可危之际,曾分别向昆明、贵阳急电求援,刘显世立即汇款十万元、子弹两百万发,此事在蔡锷事后给李日垓的信中有明确记载:“……所难者,枪枝多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银已罄,乞灵无效……若无来源,则真不堪设想。如周(指刘显世)竟能推食食我,此情实可感激”。

由以上事实,将护国起义定为“滇黔护国起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王文华对护国运动的贡献

王文华(1889—1921)字电轮,贵州兴义人。是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外甥。青年时期,他在贵阳读书时,得识老师张意,经张的介绍,结识自治学社的张百麟、平刚、周素园等。接受了民主思潮,决心从事革命事业。贵州光复后随刘显世入省,曾任巡防营长,后来他看到巡防营的腐败现象,认为军队要有战斗力,非改建为新陆军不可。改制后,将陆军编为六个团,自任第一团长,实际他已是贵州陆军的首领。

1. 秣马励兵、应时起事

王文华自接其兄王伯群告以梁、蔡欲图在西南首义,嘱其“秣马励兵,应时起事”后,即创办模范营,由卢涛任营长,抽调各团军官

轮流来省训练。又接受卢涛建议,邀请云南讲武堂毕业、在滇军中任职的军官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发年等十多名军官来黔帮助工作。两次派李雁宾(滇人)入滇,向唐继尧询测方略,并表示,如果云南反袁,愿以所部属滇,一同行动。

2. 力主出兵讨袁、誓与共和同命

筹安会出笼后,王文华力劝刘显世“桴鼓相应”。但刘显世认为以云南一省讨袁,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贵州万不能同趋灭顶。刘显世不惟不赞成讨袁,反而向袁世凯告密说:“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臣统驭无方,罪该万死。”刘还扮演了一幕以投票方式来决定国体的丑剧,想借用假像暗示文华。刘的倒行逆施,激怒了王文华,他决然对刘说:“吾誓与共和同命,势在必行,爵使(指刘)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庭,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幸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刘又借开军事会议决定反袁与否?试图制服文华,文华洞悉其谋,在会议开始时,即首先发言,直斥袁氏“帝制自为,倾覆民国,大逆不道”。“今日之事,惟有发兵讨袁,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语出平刚先生《王文华传》)。显世之众,慑其理直气壮,“无敢言者”。青年军官均愿为之助。刘显世感到军心皆向文华,违之恐有不利,才勉强同意反袁。

3. 贵州武装起义,当在刘显世宣布独立前两天

云南起义之电讯传来,文华攘臂奋起,首谋响应,整队待发,戴戡由滇到贵阳,商决黔军出师计划,文华慨然以出师湘西自任,并主张乘敌不备,先出师而后宣布独立。1916年1月10日王文华即挥军由贵阳出发,19日抵镇远,扼守镇、铜要隘。王文华还布置吴传声、卢涛分南北两路防袁军来攻。元月25日袁军一部进黔阳,为黔军胡瑛部击退。贵州武装起义,实起於此时,即在刘显世宣布独立前两天。

王文华以少数未经熟练之卒,战北洋劲旅数万之众。前锋第三团团长吴传声,与敌决

战,连战皆捷,因杀敌心切,身先士卒,战歿於芷江黄坛桥。

文华所部,与北洋军师长马继曾苦战月余,最后,一团营长胡刚请命,组织敢死队,文华授以机宜,进行夜间偷袭,前后两次,均大获全胜,俘敌二千余人(后黔军即以“摸夜螺蛳”出名)。黔军勇敢善战,迫使袁军溃败,马继曾羞愧自戕。

护国黔军湘西大获全胜,粉碎了袁军经黔攻滇的企图,使袁军汪学谦“一月后饮马滇池”的狂言成了笑柄。此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川西及川南护国军的士气,稳定了盲义地滇黔两省的外围,并钳制了袁军攻取桂北的图谋。推动了南方各省的反袁运动,很快粤桂两省宣布独立,四川督军陈宦,本系袁世凯心腹,此时亦宣布独立。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不得已於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至此洪宪数终,共和再造。

湘西战役,王文华以弱击强,以少胜众,以此奠定了护国军走向最后胜利的基础。王文华的战绩,享誉全国。他说明正义战争终究必胜的道理。蔡锷曾赞誉:“黔军出川湘苦战,常出奇制胜,以少胜众,迭复名城,强虏丧胆,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1916年7月13日,王文华率护国东路军由龙溪口凯旋返筑,刘显世率军政长官及绅、学、工、商各界万余人到郊外迎接。达德学校师生赠陆军旗一面,以表敬意。

(三) 在沪被刺,英年早逝;北伐成功,国府明令褒扬

王文华在沪期间,谒中山先生,孙先生授于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委之职,命其说服浙督卢永祥,组织江浙联军北伐,因此为南北军阀所忌,暗中联合,在沪刺杀了王文华。恶耗外传,群情哀悼,孙中山先生尤为痛惜,如伤左右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载:“前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被刺身亡”。原文:“王文华字电轮,贵州兴义人,幼年股膺革命主义,曾创办体育协会,密谋革命。旋投身军旅,初任黔督刘显世之副长官,继升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民

“天津会议七君子”中的陈国祥

修文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陈国祥(1877—1921),字敬民,修文县人。其父陈后琨为光绪九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湖南清泉县令,卓有政声。陈国祥小时聪颖过人,性情敦厚,18岁时其父去世,家道中落,然于困境中勤奋学习,乡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翌年东渡日本,进东方法政大学深造。

陈国祥在日本受梁启超改良主义影响,参加“政闻社”为骨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归国,再入翰林院任编修加待讲銜。次年得巡抚林绍年举荐为河南法政学堂教席,继为河南咨议局筹办处总办。民国元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在北京参与组织共和协进会。后共和协进会与进步党合并,陈国祥成为进步党主要成员。1912年陈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副议长。国会解散,任参议院参政。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陈国祥与梁启超、蔡锷等在北京、天津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滇黔起义,武装反袁。“天津会议”后,蔡锷被袁世凯滞留北京,陈国祥冒着

生命危险协助蔡锷离京,遂被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之一。护国战争期间,陈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为梁启超、蔡锷提供情报,为护国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

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陈国祥仍任众议院副议长,直至民国七年(1918年)国会再次解散为止。任副议长期间,陈常住天津,与皖系军阀吴光新等雍战,每胜负以万计,数月之间,陈赢积数十万元。遂与梁启超合伙投资吉林省,大买俄国股票。又在京收购书籍字画,名其藏书处为“小玄海楼”,凡钤有“小玄海楼”印记的图籍,皆为陈氏所藏。所收书画极为名贵,如黄小松藏汉碑拓石四种,陈竟以万金收购,不以为侈,一时成为收藏家之豪举。不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吉林商业受挫,陈国祥经济极窘,于民国十年(1921年)病逝北京。陈氏死后,藏书被其友以8000元购去,后散失殆尽,小玄海楼之名也知者不多。

资料来源《修文县志·人物志》及1992年《贵州方志·志书集粹》。

(责任编辑高书勤)

国四、五年,护国军之役,力主讨袁,刘显世任之为东路司令官,率三团之众,东下与袁军马继曾部战,惟刘显世阴扣其军饷,王文华善用士气连战皆捷,终迫马继曾自戕而死。袁毙,战停,王文华以功升第一师师长。六年文华游京沪,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军兴,王文华以师长兼黔军总司令,入川拒北军,威名盖著,而刘显世、刘显治忌之。九年春,文华至沪,国父任为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命其往晤浙江卢永祥,说其共伐曹吴。诎於本日,在上海后马路遇刺身死。年三十二岁。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统一全国。民国十九年

(1930年),国民政府追念文华先生勋,明令褒扬,褒扬令如下:“故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为国驰驱,忠勇夙著,辛亥革命,建绩黔中,讨袁军兴,首先响应,护国一役,又复出兵湘蜀,百战艰辛,嗣值西南糜烂之秋,毅然随先总理於上海,筹划军事,多所赞襄,壮志未展,赍志以终。軫悼劳绩,前经照准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迨者莛蕘大难,懋赏叠颁,旧勋前功,尤应崇奖。王文华着晋升陆军上将,交军政部照陆军上将阵亡从优议恤,用示政府笃念忠荃之至意。此令。”

(责任编辑高书勤)